

現代徐霞客——丁文江（三）

· 徐慎緘 ·

富家子弟出身的北政府司法總長羅文幹，時常取笑丁文江「寒儉」，但是胡適却認為丁文江並非寒儉，而是他處處小心謹慎，他花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他才能够終身不欠債，因而保有獨立清白之身。丁文江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胡適曾經指出這正是他嚴格的科學化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胡適還曾自疚的說：「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獨少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不過，胡適又說過：「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

這一點，固然是胡適有所據而發，他所根據的是民國十一年，丁文江以「宗淹」的筆名，在努力週報第七期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內容即在他提出將來如若過政治生活，所應有的幾種預備，歸納起來，約可以分為下列的四項：

一、保持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說，乃在切勿「作為無益」，積極言之，則躬行克己，尤須以「責人必先責己」為前提。

二、要做有職業的人，並須增加職業上之能力。

三、設法勿使生活水準提高。

四、就所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乃至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準備。

祇是，以丁文江平素的言行，覆按其一生的「政治生活」，胡適所謂之「小心謹慎」，很可

能會反證丁文江是在「但見其小，忽焉其大」了。如所週知，一個人立身處世，首重出處。易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漢蔡中郎薦皇甫規文尤謂：「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儼然不污」。由而可知出處的最低限度行為標準，必須是「抱義而行」。好了，再讓我們以此古今猶仍的標準來衡量丁文江的政治生活。丁文江之與國內政治人物結緣，頭一個就是他自小仰慕的百日維新、戊戌政變，以康梁並稱的保皇要人梁啟超。

梁啟超稱之為本師

丁文江十五歲（實足年齡方祇十四）東渡日本，他每期必讀梁啟超所主持的新民叢報，而且還在看過以後付郵寄回國內，寄給他的大哥閱讀，可是，當時梁啟超正在東京，他却無緣一親韓荊州，似乎也並不積極的作此想，一直到民國七年，梁啟超假雲南首義之餘威，在段祺瑞內閣中當了四個半月的財政總長以後，終於鬧得頭痛欲裂，刺激太過，不得已而辭職。自此開始籌劃出洋游歷，七年十月十日袁世凱的老朋友徐世昌出任北政府大總統，十二月初，梁啟超督京與徐大總統接洽多次，並與駐京各國公使週旋一切。梁啟超以個人資格前赴歐洲的事方告確定。究竟是怎麼樣才確定了的呢？梁啟超在寫給他長女梁思順的信裏說：「經費殊不充，公家所給僅六萬

，朋舊餽贈約四萬耳」，此即謂，梁啟超在用公家的錢在作私人旅行。因為他在這封給他愛女的信中居然強調：「此行全以私人資格，不負直接責任。」

梁啟超獲得北洋大總統徐世昌的敷衍羈縻，免得他在北洋軍閥大分裂下趁直皖兩系對立鬭爭之際而推波助瀾，鬧成天下大亂，方始忍痛從公庫提出六萬大洋，再致私人程儀，請翻手為雲覆手雨的梁啟超，早日出國遠行。梁啟超乃命他的友好門生故吏蔣百里（方震）、張君勱、劉子楷三人同行，復聘滬上金融鉅子徐新六（振飛）為財政經濟顧問，實則為經費上的後臺老關，復以楊鼎甫（維新）擔任錄事兼私人僕役。梁啟超想來想去，他隨行人員的名單內，財政、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各方面的人才應有盡有，獨獨少了一位科學專家。梁啟超不由不想到一項嚴重的後果，假如獨缺這位科學專家的話，又怎能對現代的歐洲，有澈底的認識？

徐新六和丁文江曾是留英同學，素來相交莫逆，互有瞭解，當徐新六聽說梁啟超就祇缺乏這一方面的人才，他馬上就想到了丁文江，於是鄭重其事，語多溢美的向梁啟超推介。丁文江自小仰慕梁啟超，這還是他們第一次正式見面。

梁啟超、蔣百里、丁文江一行七人，是在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北京啟程赴歐的，經過天津一宿，二十六日抵南京，在馮國璋的督軍衙

門吃過午飯，便乘車往上海。二十七日晚上，一行七人和進步黨的要角張東蓀、黃溯初（羣），整整談了一個通宵，所得的結論是：「着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舍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梁啓超並且聲言：「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因此梁啓超公開發表他們此行的目的，要言之爲以下兩點：一、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指第一次世界大戰）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

二、由於認爲巴黎和會真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下永久的和平基礎，想以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伸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的力量。

字裏行間，並無一語隻字言及於公，但是，梁啓超一行旅費的大半，顯然出之於公幣。這種行爲，比丁文江所恨的「拿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情節還要嚴重得多。我們不能想像歐化程度如此其深，一生小心謹慎的丁文江，會不知道此行經費之來源，這便是他未能從大處着眼堅持其原則處。固然是梁啓超拿的錢，然而丁文江終不能否認他不在花錢之列。

丁文江隨梁啓超一行旅歐，除了以科學專家的身份，擔任梁啓超的顧問之外，他既與徐新六打前站于先，又教授梁啓超超驗英文，並爲他擔任翻譯於後，梁啓超在給他弟弟梁啓勳的信中曾經承認丁文江是他的英文老師，尚且以「本師」相稱，他在那封信裏說：

「此行若通歐語，所獲奚啻十倍？前此蹉跎，雖悔何裨？今惟汲汲作補牢計耳。故每日所有空隙，盡學以學英文，雖甚燥苦，然本師（原注：丁在君）獎其進步神速，故興益不衰。」

梁任公其有厚望焉

丁文江素性憨直，常以至性至情待人，對於「德高望重，著述極豐」的梁啓超，自亦未能例外，他在梁啓超跟前，有問必答，從無隱諱。梁啓超曾經問起他：「予何人也？」丁文江的回答則是非常直率的下個結論，他說：

「任公先生個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難做一個好政治家。因爲在政治上，必須時時具有一個冷靜的頭腦，方始不致誤事。」

於是梁啓超又問：

「那麼，你認爲我做什麼工作比較相宜呢？」

丁文江侃侃然答道：

「我發現先生的分析能力極強，如果能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我爲先生應該放棄政治活動，從事學術研究。」

當時，梁啓超表示丁文江的意見很對，而丁文江也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名青年後輩，居然能够使譽滿中外的大人物，在他春秋鼎盛時期（當年梁啓超祇有四十六歲），居然能聽從他的忠告，翻然改圖，轉換了一生的方向，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因此，他非常熱心的爲梁啓超搜集了好些研究史學的英文書籍，譯給他聽。梁啓超在史學方面的若干重要著作，如「中國歷史研究法」、「新史學」、「史學之世界說」、「歷史與人種之關係」等，正是如此這般得來的。梁啓超對於近代史學和傳記學的卓越貢獻，丁文江在幕後實與有力焉。

民國九年三月五日，梁啓超漫遊歐美歸來，丁文江則先已返國，回國後的梁啓超，除了對山東問題發表個人意見，晉謁北政府大總統徐世昌

報告歐遊經過，一度致書徐世昌，請他釋放因八年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他果然遵守他和丁文江的前約，不談政治。在他寫給女兒思順的家書中還曾說過：

「……滬上政客未接一人，最爲快事。……以二十九日入都（按指北京），與當道循例一週旋。初三日便返津，除最稔諸友共作飲食宴樂外，一切酬應皆謝絕。東海（指徐世昌）約宴亦謝之。」

凡此口脂，跟曩昔重排場，好熱鬧，輒與當時權要交接極歡的梁任公，簡直判若二人。民國九年一年之間，梁啓超一面埋首著述，一面着手創辦事業。他所計劃要辦的事計有發起中比公司、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成立講學社、整頓改造雜誌、發起國民動議制憲運動等項，够他忙的了。一時之間，國人盡知梁啓超走回學術研究的老路，他很顯然的表示他將與政治絕緣。

丁文江則在返國以後仍然當他的地質調查所所長，梁啓超要辦那麼許多的事業，當然需要相當可觀的經費，在籌募基金方面，他確曾打過丁文江的主意，想從他的身上覓獲可觀的財源。這一點，他也曾在他的家書中很明顯的透露過他內心的計劃，梁啓超說：

「前隨我遊歐之丁文江任地質調查所所長多年，中國何處有佳礦，應如何辦法？情形極熟，但吾輩既無資本，只得秘之，以俟將來耳。」

由而可見，梁啓超是以丁文江爲對外秘而不宣的一宗寶，未來之大發開礦之財，端在此君身上。殊不料，丁文江是學人，地質調查所是國家的調查機構。他本人全無發財興趣，而且也不想不到利用調查所得幫人家發財致富。丁文江在地

質調查所前後將近二十年間，他的足跡遍及全國各地，他所發現的礦脈，和各地地質狀況，全都作了公開而詳盡的報告，丁文江為國家留下了無數的報告、紀錄與圖件，數以噸計的化石和標本。例如民國二三年間他曾兩度深入康滇，研究東川、會理之銅礦、箇舊之錫礦、宣威之煤礦，二年又赴井陘、娘子關、平定一帶考察煤田、鐵礦並研究地質，再轉赴河北、河南交界之磁縣、六河溝探勘煤田性質。此外如南京山地、蘇皖浙三省界上、山西三門、蔚縣、廣靈、陽原之煤田、宣化、龍關、大同、北票、鶴立岡、山東中興煤礦、湖南萍鄉、湘潭、耒陽之煤田，廣西南丹、河池之錫礦，遷江之煤田，馬平之石灰岩、貴州全境之探勘旅行，他都留有寶貴的紀錄，顯然他是孜孜矻矻於調查開發國家之富源，他不曾計及親友和個人的發財問題。

但是梁啟超對於丁文江手中所掌握的莫大財源，却是處心積慮，頗有野心的。問題在於，果然有這麼一天，梁啟超得了一筆足夠的資本，可以開那一本萬利的礦，以梁啟超辦事需要經費之殷急，這些事業又頗為丁文江所贊許，所樂觀厥成，以及梁、丁之間友誼的密切，那麼，丁文江會不會如梁啟超之所願，在職務範圍之內給他若干暗示或方便？這一回事相當的耐人尋味，因為丁文江果若如此，那不但將成為他一生的白璧之玷，同時就法律而言，他也難辭「洩露業務上之機密，圖利他人」的刑責。

丁文江甘於暫時拋下他方自一手建立的地質調查所，和許多重要而亟於進行的地質調查工作

，跟梁啟超跑了一趟歐洲，充翻譯，當私人教師，除了自幼仰慕，羨識一點感情作用，在他來說確是得不償失。自保皇黨以迄進步黨的種種作為，丁文江如非居心偏頗，他應該不難看出康有為、梁啟超那一幫人的行迹。康有為不但搞政治每每昨是而今非，朝秦暮楚，敵友不分，尚且對於歛財之道也是不擇手段，唯利是圖，廣東人所謂之「撈家」也。跟梁啟超之輩相交結，以丁文江的書生脾氣，結果居然沒有受到譏評，還得算是他的運氣。事實上，梁啟超垂涎開礦獲大利，幾幾乎乎就找到了一位姓林的華僑主顧，那是由他做外交官旅居海外的女婿、女兒所介紹，梁啟超曾在致女函中說：

「茲有寄林某一信，並中國公學紀念印刷品兩冊（原注：胡適之即在本公學出身者，同學錄中有名），可交去，並極力鼓起熱心，若彼能捐五十萬，則我向別方面籌捐更易，吾將以此為終身事業，必能大有造於中國。彼若捐巨款，自必請彼加入董事，自無待言，此外當更用種種方法為之表彰名譽，且令將來學生永久念彼也。汝前信言彼欲回國辦礦，若果有此意，吾能與以種種利便。……」

利便在何？當然在於丁文江千里跋涉，深入不毛所獲致的寶貴資料。以上所錄的信中一段，寥寥一二百言，可見梁啟超這位撈家是如此的善於利用親友和各方面的關係。誠可謂：老喫老做，自然當行出色。

董顯光說他是幹才

民國十一年間，丁文江在北票煤礦公司任總工程師，董顯光先生在華北水利委員會服務，並且兼任密勒氏評論報駐華北副主筆。兩位好友的家都住在北京，工作地點則在天津。董顯光在天津前意租界三馬路十三號租了一個通樓作為下榻之處，他邀丁文江和他同住，把通樓隔為前後兩間，丁文江在前而董顯光居後，照拂他們的是華北水利委員會一名工友，兩位先生在住處只吃早晚兩餐，飲食非常簡單，通常都是一菜一飯，因為丁文江喜歡吃黃豆燒肉，幾乎不可一日無此君，於是那道黃豆燒肉就成了他們整整喫了一年的唯一菜餚。

丁文江和董顯光一樣，不愛看電影，不喜無謂的交際應酬，他們同屋居住相處一年之久，但是因為雙方的工作都很忙碌，公餘之暇則丁文江潛心中西典籍，董顯光忙於埋首著述，兩個人唯有利用吃早、晚飯的時候略為交談，或者特地抽空來長談一次。

董顯光說丁文江的中文、英文和德文的造詣都「極深」，治學的範圍又「極廣」，因此他通曉天文地理之外，對於政治也有很濃厚的興趣。他說他曾看見丁文江在從事過去五百年間中國宰相的籍貫考據，他甚至於寫成了一本書，書中的結論是根據統計，前五百年間的中國宰相，以南方人居多，而在南方人中又以蘇北人居多數。當時董顯光覺得丁文江既然是一位地質學者，又何必以其有用的時間來做這種無關緊要的研究，所以曾有一天他勸丁文江說：你與其研究前五百年間中國歷朝宰相的籍貫，還不如利用空餘的時間

去找金鑽、銀鑽。

當下丁文江便回答他說：

「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質。如果我找到金鑽銀鑽，而不了解人事問題，那金銀仍將被偷盜以去，弄得更糟。」

董顯光不失為一位目光敏銳的觀察家，丁文江確實對於政治有着非常、非常濃厚的興趣，這一點是他在學術界的任何好友都無法為之否認的。胡適也曾說過：

「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桿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

不過癥結在於丁文江僅祇是有自信、有把握、有信心，他能搞政治——改良政治，並且他堅信如果政治不良，那麼一切實業、教育全都辦不好。但是，他卻始終不曾提出過什麼改良政治的主張。民國十二年他作過一次「少數人的責任」的演講，一開頭就一針見血的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更強調的說：

「只要用少數裏面的少數，優秀裏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種有智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但是他又有一句口號：

「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

丁文江所謂的「放火」，直指「使用暴力的革命」，因為一旦放起了火來，總難免會有乘火打劫的人。所以他的政治信念乃在於他的本身，以及像他那樣「有道德」「有智識」的人，不管當權者是武人、是軍閥、是政客、是國民公敵，只要能够參加，而發揮其「改良作用」就好。像這樣全無主張的「改良主義」論調，和梁啟超的自保皇而立憲，而護國而終至焦頭爛額，不得不宣佈暫時退出政壇，其實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兩者距離極為有限，難怪丁文江一參與政治，立刻就惹火燒身了。

研究前五百年中國宰相籍貫的那一本書，後來始終不見出版。——董顯光及後回想，他那本著作旨在研究地理與人事的關係，其實確是有它的價值的，董顯光頗以其未能問世為憾。

跟張君勱一場筆戰

十二年春夏之交，梁啟超的兩位好朋友，丁文江和張君勱，因為人生觀的論爭，發起極劇烈的科學與玄學之筆戰，引起國內外學術界人士一致的重視，至今猶被譽為影響我國近代學術思想既深且鉅的論戰之一。雙方交手之初，丁文江一開頭就表示他決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的「精神文明」，他要打倒「中外合璧式的玄學」下的「精神文明論」。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及二十二日，他在「努力週報」第四十九、五十兩期連續發表「玄學與科學」，像在中國學術界平靜無波的湖面投下了一方巨石，立刻掀起軒然大波。他闡明他理想中科學訓練的人生觀，簡而言之，略如以下所引之

一段：

「科學，……是教育同教養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甚麼事，都能平心靜氣的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簡單，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思想，而想象力愈增；用經驗來指使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瞭然於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得透澈，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

丁文江坦率的表白，他不佩服張君勱所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他所用的文字十分精闢犀利，例如他套顧亭林（炎武）的口脂痛罵當時的玄學崇拜者流，就曾這麼直截了當的說：

「今之君子，欲速成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

丁文江以科學界的聖人達爾文、護法赫胥黎、名將蓋爾頓（Francis Galton）為堅強有力的背景，對擁護玄學者大肆撻伐，一連寫了「玄學與科學」、「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玄學與科學的討論與餘興」三篇文章，都發表在「努力週報」。當時羅家倫先生在美留學，讀了他的這些篇章以後，盛讚其：「……思想之清晰，筆鋒之犀利，字句的謹嚴，頗有所向無敵之概。」而時在巴黎求學的傅斯年先生也說：

「在君（丁文江）必是一個深刻的受赫胥黎影響者（嚴復並不是），他也在中國以他的科學、玄學戰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對方太不行了）」。

大概是素來跟寶山張家兩位賢昆仲——張君勳和張嘉璈關係太密切了的梁啟超（有謂梁啟超和張君勳拜過把），眼看著「對方太不行了」，於是乃在養病翠微山期中，力疾而起寫了關於玄學、科學論戰的「戰時國際公法」，「人生觀與科學」兩篇文章，表面上說是唯恐丁文江、張君勳過用意氣反傷和氣，因而由他來導入為真理而論戰的途徑，但是他在這兩篇文章裏畢竟也說明了他個人對玄學和科學的態度。梁啟超說：

「人類生活固然離不了理智，但不能說理智包括盡人類生活的全內容。此外還有一極重要部份——或者可以說是生命的原動力，就是感情。」

梁啟超尤其在第二篇「人生觀與科學」中，對玄學、科學論戰作了一個結論：

「我把我極粗淺、極凡庸的意見總括起來，是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關涉情感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

丁文江和董顯光在天津稅屋而住將近一年，有時候兩位好友也會抽暇談談問題，每當丁文江向董顯光娓娓細訴他的讀書心得，董顯光很佩服他的博學多聞，偶然言志，董顯光常說他想辦一份中文報紙，丁文江聽後極表贊許，一再的鼓勵董顯光說辦就辦。——他在朋友之間向以熱心誠懇，願予並且善於為朋友安排諸事而著名，因而朋友習於稱他「丁大哥」，以示親暱，——祇是當年想憑個人之力辦一份報紙實在不太簡單，因此儘管丁文江慫恿甚力，董顯光的願望還是遲遲不曾實現，這一來反倒成了個「皇帝不急，急煞太監」之局，有一天丁文江居然用上了激將法，他「責問」董顯光道：

「你的報紙如果再不辦出來，那就是你沒有出息！」

「沒有出息」這四個字實嫌不當，份量太重了些，但是，董顯光深知丁文江出自一片衷誠，為了不辜負好友的盛情與期望，他毅然決然盡出數年積蓄數千銀元，買了幾部舊印刷機和全部鉛字，辦起當年也曾享譽一時的「庸報」。「庸報」問世，董顯光順理成章的請丁文江撰寫社論，丁文江立即欣然接受邀約。

一度失足淞滬總辦

「一生小心謹慎」如丁文江，平生第二件未能顧全大節出處的是他曾依附北洋軍閥孫傳芳，當了一年多全國第一肥缺的「淞滬商務總辦」。關於這一件事，胡適也說：「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在民國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傅斯年曾為他解釋的說：

「他在淞滬任中，為後來之上海特別市建造弘大的規模，只可惜後來人並不能步趨他。他除了好些積弊，他從外國人手中爭回重大的權利，不以勢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這些權利的外國人，反而能够誠意的佩服他，雖然他當時

的上司是孫傳芳，然而他並不是孫傳芳的私人，他仍是為中華民國服務。後來孫傳芳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時，他並沒有跟他。」

傅斯年先生為知己好友挺身而辯的熱情，具見前輩風範，實在是很令人感動的，不過，無論如何，他說的話有點勉強。這是明眼人一望可知的事實，何況，即連傅先生自己也並不否認，為丁文江之投孫，當年還有一段極精彩的故事。

民國十二年四月丁文江和張君勳開玄學與科學論爭的筆戰，傅斯年在海外讀到了丁文江的文章，大為傾倒。從此心目之中有了丁文江這樣一位人物，可是十五年初丁文江應孫傳芳之邀出任淞滬商務總辦，傅斯年在英國得了這個消息，不禁大為憤慨，他深以為像丁文江這等人才，他為什麼要仕於錢鏐之朝（錢鏐做時販鹽為盜，後唐乾符年間經鎮將董昌表為偏將，敗王郢，破黃巢，平劉漢宏，鎮海軍節度使，又平董昌之叛，天復間封越王，天祐初封吳王。梁太祖即位復封吳越王。終自稱吳越國王，居臨安故里即今之杭州，在位四十一年），以堂堂正正的名學人，去跟呂惠卿一輩人物來往（呂惠卿字吉甫，被王安石薦為太中允，事無大小，必與謀，曾預王安石頒行新法事。安石既敗，呂惠卿驟致執政，深忌安石復來，凡可以阻安石者，無所不為，安石深悔為其所誤，旋罷相，出判江寧府，當政者咸惡其為人，無敢引入者，以是轉徙外服而卒。傅斯年以呂惠卿隱指孫傳芳，可能鑒於孫傳芳之為吳佩孚一手提拔，而後竟坐看吳氏覆亡）。因此，他對丁文江的一片仰慕，便一變而為深惡痛絕，

快人快語如傅斯年，當時就憤憤然的揚言：

「將來我回國，第一件事就是殺了那丁文江！」

話講過了，時日一久，也就忘諸腦後。傅斯

年回國了，他在民國十八年初夏和丁文江初度會晤，照他自己的說法是：「不久即成朋友，一年

後成好朋友，最近幾年中竟成極好的朋友。」就在丁傅由好朋友變成極好的朋友那一階段，民國

二十年春天，傅斯年請了幾位朋友在家裏喫飯，丁文江和胡適也在座，席間，傅斯年議論風生，

他談起了某位熟人，對他頗有非議。胡適則批評他的論調不公平，兩位好友終於抬起了槓子，胡

適便直率的問傅斯年說：

「你這種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記不記得你在巴黎的時候，曾經一連向我講過三遍，你回

國的第一件事就是殺了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就在你旁邊，你幹嘛不殺他呀！」

舊話重提，當着丁文江的面兜了出來，難免使傅斯年大窘，後來他再遇見胡適，當面埋怨他

那天晚上太惡作劇。胡適卻嘻笑怒罵的說：

「你放心好了，在君聽了你那個話，不但不會生氣，反而還會高興哩！他能把你這位殺人犯變成朋友，豈不大可自豪？」

跟梁啟超素來接近的若干人物，當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萬民喝望全國統一迅將實現之前夕，

突然投入軍閥陣營，甘為禍國殃民之北洋軍閥虎俚，有許多蛛絲馬跡，推究得出來很有可能是

梁啟超暗中操縱，而由蔣百里出之以首倡。曾經力勸梁啟超不問政治，致力於學術研究的丁文江

，他也捲進了漩渦，或爲他過於自信有「改良政治」的能力。

投靠軍閥大有內幕

當時正有鼓盆之痛，爲原配夫人營葬，自己又因便血而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的梁啟超，在他的致兒女家書中迭曾提過：

「……國事局面大變，將來未知所屬，我病全好之後，對於政治不能不痛發言論了。」（十五年九月四日）。

「時局變化極劇，百里所處地位極困難，又極重要，他最得力的幾個學生都在南邊，而孫傳芳又卑禮厚幣要伏他做握鵲毛扇的人。但北伐軍

入江西，孫爲自衛，不得不決裂。我們的熟人如丁在君、張君勛、劉厚生都在孫幕，參與密勾，

他們都主戰，百里亦不能立異，現在他已和孫同到前敵去了。老師打學生，豈非笑話（按指國民

革命軍第八軍長唐生智是保定一期的學生，當時蔣百里正任校長），好在唐生智所當的是吳佩孚

方面，孫軍當面接觸的是北伐軍。這幾天江西的戰爭關係真重大，若孫敗以後，……（原注：百

里當然跟着毀了。）若孫勝北伐軍敗，以後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計劃是要把北伐軍與唐生

智分開，北伐軍敗後，謀孫、唐聯和，果能辦到此著，便當開一嶄新局面。國事大有可爲，不能

不付諸氣數了。」（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給孩子們的信）。

「時局變遷非常劇烈，百里聯絡孫（傳芳）唐（生智）計劃全歸失敗，北洋軍閥確已到末日

了，將此麻木不仁的狀態打破，總是好的，但將來起的變症如何，現在真不敢說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給孩子們的書）。

「思永（梁啟超的兒子）問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孫傳芳那邊？這話很難說，內中關係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蔣百里二人。他們與孫的關係都

在一年前，當時並沒有孫和北伐軍對抗的局面，孫在北洋軍閥中總算比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也

總算比較清明。他們與孫合作並不算無理由。既已與人發生關係，到吃緊的時候舍之而去，是不

作興的。直到最近兩個月，孫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結二張（張作霖與張宗昌），和丁、蔣等意見大

相反，他們方能老老實實的和（孫傳芳）脫離關係。中間這一段誠然是萬分不值（原注：既有

今日，何必當初），然在一年前他們的夢想原也很難怪。（原注：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辦一較

良的市政，以漸進手段收回租界。）至於我呢，原來不甚贊成他們這類行動（原注：近數月來屢

次勸他們自拔），但我們沒有團體的嚴整組織，朋友們總是自由活動，各行其是，亦沒有法子去

部勒他們（原注：也從未作此想），別人看見我們的朋友關係，便認爲黨派關係，把個人行動認

爲黨派行動，既無從辯白，抑亦不欲辯白。我之代人受過，總是免不了的（原注：亦自甘心）。

「（十六年一月十八、二十五日，給孩子們書。）

作孫傳芳後方重鎮

「我在今日若還不理會政治，實在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不過出面打起旗幟，時

機還早，只有秘密預備。」（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給孩子們書）。

梁啟超在國民革命軍第一期北伐將成的一段期間，他對於丁文江、蔣百里投效孫傳芳一事，其因局勢之演變，歷次所作不同之反應與所持之態度，略如以上所摘信函原文。以下還得錄一段蔣百里在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致任師書，他在信中報告梁啟超說：

「在漢上托翊唐帶奉一檄，想蒙入鑒。到滬由溯初（黃羣）處得讀手示，知（以下述梁啟超之病況）……至為懸念。天如（唐天如，曾在吳佩孚幕中任要角）特因此北行，想日內當可到京，君勛想當先到矣。……季常（蹇季常，貴州人，梁啟超之頭號智囊）尚在南京，約月杪歸京。……在君（丁文江）在滬忙極，在短時期內總可安定。……漢孫日內仍歸漢，以搏沙有事相需也。」

就這麼短短的一段，可以令人很明顯的看出，梁啟超的那些「自由活動」的朋友，爲了「謀孫傳芳、唐生智之聯和，開一嶄新局面」，幾乎是精銳盡出，其志當然不小。譬如以蔣百里去吸收他的學生唐生智，以丁文江爲孫傳芳的後方重鎮，飛獨輓輓，而以丁文江與上海大老陳陶遺、浙江省長陳儀組爲三人聯合陣線，企圖左右孫傳芳，益之以張君勛之僕僕京滬，唐天如之往返聯絡，黃羣坐鎮上海，蹇季常位置南京孫傳芳總部，又有翊唐、漢孫、搏沙之參與密勿，擔任聯絡，梁啟超拿出來的這個陣營還算小嗎？還有蔣百里這封信上所未能一一提到的，更多的「自由活

動的朋友哩。」筆者提出此強有力的證據，即在於說明丁文江之突然「熱心政治」，爲北洋軍閥孫傳芳效力，決不是單獨的，自由的行動而已。

倘如再看梁啟超自十五年九月四日，到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幾封家書摘語，梁啟超之爲此一軍閥政客結合事件之發踪指示，幕後操縱者，可以說是昭然若揭，無從遁形。十五年九月四日他躊躇滿志的說：「我病全好之後，對於政治不能不痛發言論了。」二十七日又詳述其謀孫唐聯和，開新局面的計劃，而馨香禱祝，將「國事大有可爲」，「不能不付諸氣數」。十二月二十日直承蔣百里聯絡孫唐的計劃全盤失敗。十六年元月十八及二十五日函中即談之此事爲蔣百里、丁文江等之自由行動，他亦「甘心」代人受過。一月二十七日又再作宣言，梁啟超要秘密預備來日再舉。那正是保皇餘孽，進步黨人在國民革命的大纛之下全盤失敗。

傅斯年說要殺了他

就在丁文江聽到胡適提起傅斯年爲他屈身事賊，氣得宣稱要殺了他的話之後不久，他曾「常常」向傅斯年解釋那一回事的動機和下臺情景。他說他當時的目的在於——丁文江認爲改良中國的政治（其實充其量只能說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時便「機不可失」。同時，他參加孫傳芳集團居然還是個三人團，除此之外，還有陳陶遺和陳儀。

想當年，孫傳芳號稱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聲勢煊赫，氣焰薰天。孫傳芳字聲遠，因

而部下尊稱聲帥。他是山東泰安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回國後在北洋新軍第二鎮（師）王占元部下充任低級軍官，民國成立後王占元得了湖北督軍的寶座，孫傳芳自此官運亨通，扶搖直上。由團長而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王占元貪財好貨，經常剋扣軍餉，民國十一年因官兵鬧餉而引起兵變，宜昌、武昌都受到亂兵的焚燒劫掠。當時唯有孫傳芳的部隊保持完整，不曾潰亂，這是他往後受知於吳佩孚的由來。

由於駐湖北的北洋軍兵變，加以王占元的多年橫征暴斂，大肆搜括久已爲鄂人所痛恨，湖北籍的軍政界人士蔣作賓、孔庚等爲解鄂人倒懸，聯絡湖南、四川兩省之軍，發起武力驅王運動，這便是民初歷史上的援鄂戰爭，王占元的殘餘北軍不堪一擊，久已垂涎武漢居天下之中的直魯豫巡閱副使吳佩孚，乃自洛陽大舉南下，擊敗湘川兩軍，從王占元手中取得湖北地盤，派其部將蕭耀南爲湖北督軍，吳佩孚再兼兩湖巡閱使。孫傳芳因爲在這次大變亂裏，始終能够確保自己的部隊，而且作戰極肯賣命，迭有良好的表現，因而獲得吳佩孚的賞識，收容他在軍威上將軍的麾下，尙且破格提拔，不次擢升。當到了第二師師長，兼長江上游總司令，以湖北宜昌爲其根據地，對吳佩孚唯命是從，執禮尤恭。

民國十一年四月第一次直奉之戰爆發，吳佩孚一舉擊敗張作霖，以曹錕、吳佩孚爲首之北洋直系，取得北政府控制權。十一年十月北洋皖系大將徐樹錚、粵軍許崇智聯絡旅長王永泉等逐走

福建督軍李厚基，孫傳芳奉吳佩孚之命援閩，三月六日率部進抵福建延平，二十日底定全閩，孫傳芳也當上了福建督軍，漸次獲得了福建地盤。十三年九月直系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和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爲了搶奪上海這一隻金飯碗，而釀成了蘇浙之戰又有人諛稱爲「中國內部的鴉片之戰」，孫傳芳乘機奇襲杭州，逐退盧永祥而併吞浙江，由吳佩孚一力保舉他爲浙閩巡閱使，兼浙江督軍。十三年九月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因馮玉祥倒戈而敗，退往武漢，奉軍大舉南侵，分據江蘇、安徽。孫傳芳又得吳佩孚之助，兩路夾擊，驅逐奉軍，再利用皖贛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到這時候，他已奄有蘇、浙、皖、贛、閩五省之地，而開府南京，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儼然以東南盟主自居。

民國十五年初，國民革命軍北伐雄師，業已席捲兩湖，進兵江西，和孫傳芳的東南軍閥勢力，發生直接衝突。丁文江就在這個時候，以丁文江、陳陶遺、陳儀三人團的姿態，出而爲孫傳芳之虎倀。三人之中，陳陶遺原名公瑤，字陶怡，號道一，又署劍虹，江蘇金山人，中國公學肄業，早年曾參加同盟會，當過同盟會江蘇支部長，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被舉爲參議院副院長，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他曾避往東北，組織戊通航運公司。十五年投效孫傳芳，任江蘇省長。丁文江和陳陶遺等參與孫傳芳的戎幕之初，他確實很想有一番作爲，他曾力邀正辦庸報頗有起色的董顯光，一道南下，出任上海交涉使。董顯光說他所辦的庸報方始有點頭緒，一旦遠離，

事功即將半途而廢，他說他實在不想做官。可是丁文江仍然一力堅持，必欲董顯光到上海去走一走，再從長計議。董顯光迫不得已，只好答應稍晚幾天再去。

丁文江抵滬就任新職，他和他的夫人住在「客利飯店」，正好胡適也住在「客利」，成了新

任淞滬商埠督辦的芳隣。胡適見過丁文江貴爲總辦時的情景，他每天都要收到不少的荐書，他總是命一名書記把這些荐書分類，歸檔，然後在他需要某種人才時，再寫信通知合乎需要而又有荐書的約期前來考試，考試及格，概予錄用。否則，他也會一一知會原介紹人。（未完待續）

堅實經營 服務大眾

彰化商業銀行

THE CHANG HWA COMMERCIAL BANK LTD.

中華民國臺灣省 創立於民國前七年

〔業務項目〕 存款、放款、匯兌、外匯、倉庫及代理業務等

〔新創業務〕

彰銀置產存款 可貸放十倍以內的資金、供你買房產、購機器

彰銀定期儲蓄存款 自動轉期辦法

轉期與領取利息都不用您操心

彰銀安樂存款 為享受安樂的晚年，請利用利息優厚的零存整付安樂存款

彰銀成功存款 以最優利的儲蓄存款，來積蓄子女就學費用

彰銀福利存款 為購建新居、擴充事業，請從今開始！

總行

臺中市自由路二段卅八號

總行臺北辦公室

臺北市衡陽街六八號

國外部 臺北市館前路六三號

儲蓄部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廿四之二

分行 全省八十一個分行

倉庫

基隆、臺北、臺中、臺南、高雄

國外通匯網遍及世界各地